

JURIS
VIVENS

伊文思 传

危险地 活着

Gevaarlijk Ieven

(荷) 汉斯·舒茨
孙红云 黎松知

译

著

Living Dangerously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荷）汉斯·舒茨

著

孙红云

黎松知

译

伊文思 传

危险地 活着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evaarlijk leven: Ene biografie van Joris Ivens / Living Dangerously: A Biography of Joris Ivens

Copyright © Hans Schoots

This edition arranged by Hans Schoots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New Star Press Co., Lt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51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险地活着: 伊文思传 / (荷) 汉斯·舒茨著; 孙红云, 黎松知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33-3093-0

I. ①危… II. ①汉… ②孙… ③黎… III. ①伊文思 (Ivens, Joris 1898-1989) - 传记 IV. ① K835.6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1036 号

危险地活着: 伊文思传

(荷) 汉斯·舒茨 著; 孙红云 黎松知 译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70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093-0

定 价: 8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高兴这本著作可以翻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是因为尤里斯·伊文思 (Joris Ivens) 这位荷兰电影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伊文思第一次去中国是 1938 年拍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20 世纪 50 年代他又多次返回中国，并给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授课。他和妻子玛瑟琳·罗丽丹 (Marceline Loridan) 历经数年跑遍中国，于 1976 年共同完成了时长 12 小时的反映中国社会的纪录电影《愚公移山》。就在 1989 年他于巴黎辞世前，还在中国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该片主要回顾了他的一生。

除了在中国拍摄的这些影片外，他还在世界上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拍摄了很多纪录片。作为一位电影人，他从 1927 年到 1989 年的 60 多年里坚持不懈地工作，我这里没有算他 13 岁时与父亲一起摄制的那部短片《小茅屋》。

在这部传记中，我尽量展现伊文思的电影与他的生活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是理解伊文思电影的关键。

当我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和私人收藏馆进行调研时，在我对尤里斯·伊文思本人、他的同事、私交朋友的采访中，我感觉到自己逐渐理解了伊文思。我希望在这部传记中，我对这位杰出的电影人的生活与工作关系的处理是恰当的。

汉斯·舒茨

2014 年 8 月于阿姆斯特丹

前言

我第一次注意到尤里斯·伊文思是20世纪60年代在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在当时被称作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的抗议集会上，我观看了他拍摄的关于越南的影片之后印象深刻。

1986年，我见到了伊文思本人，当时是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周刊》(*De Groene Amsterdammer*)撰稿而专程去巴黎拜访他，并对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毕生坚持不懈的个人追求与共产主义历史紧密交织的事迹深深吸引了我。采访结束后，我发给他我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我执着太久，我的乌托邦》(*I Clung Too Long to my Utopias*)，他致电对我说：“你的文章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希望你能够条理化这些东西。”这是他觉得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我自己当时深感极权主义对人的诱惑，并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但是我怎么能知道尤里斯·伊文思对极权主义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开始萌生了为他写一部传记的想法。长期以来，我对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甚感兴趣，而伊文思一生中很大的精力都花费在这二者的相互缠绕和影响之中。一部伊文思的传记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可以为阐释20世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与此同时，这不仅是一个令人着

迷的人生故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它也是一部承担社会责任的艺术家的纪录电影的历史。

我对现有的关于伊文思的几本著作深感不满。有几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到 20 世纪 60 年代就戛然而止，这对伊文思的一生来说，不能不说是留下了一大段的空白。伊文思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的记忆》(*Joris Ivens on La mémoire d'un regard*) 于 1982 年在法国出版，是迄今最诚实的，也是表达得最清楚和最充分的一本著作。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开始着手本书的写作。

我知道仅凭打着“沿着……的脚步”的旗号进行写作的书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尤里斯·伊文思曾在 21 个国家进行拍摄，其足迹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幸运的是，与这位电影人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收藏于欧洲，而与他相关的重要人物基本还健在并居住在欧洲。

我可以相当系统地获取收藏于欧洲的资料，此外，关于伊文思的文献资料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找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相关机构已经发给我相关材料的总览，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收藏机构如美国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 (FBI) 和波士顿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收藏馆。

还有几个地方一定会存留不少相关的重要文献档案。首先是中国。这个国家在伊文思的职业生涯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我最初决定先去中国调研，但从中国对我的信件和电话联系的反馈情况来看非常令人沮丧，于是，我改变了初衷。我担心仅凭个人的联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与古巴的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 (Santiago Alvarez) 探讨过这个问题之后，我更加确信，即便我去了中国，除了官方资料之外我将一无所获。(阿尔瓦雷斯给我讲述的关于伊文思的一切归结为：伊文思是“一只雄鹰，他犀利的双眼洞察着历史和革命斗争”。) 我早先曾经访问过中国和古巴，对此也有体会。庆幸的是，伊文思在中国停留时期的很多文献资料都可以在荷兰奈梅亨的尤里斯·伊文思欧洲基金会馆藏中查阅到。

还有两个可能收藏伊文思信息资料的地方是苏联的克格勃 (KGB) 和原民主德国的斯塔西 (Stasi) 档案馆。但克格勃坚持说，他们没有与伊文思相关的任何文件，要查阅斯塔西的文献档案又非常困难，手续繁多，等待的时

间长达数年。我希望以后的伊文思传记家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本书是根据原始的文献资料撰写的：信函、笔记、日记、报告、剧本、拍摄方案等。这些资料浸润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其中传达的信息还没有被记忆所改变和褪色。通常会有几份文件和几封信函讲的是同一主题的事情，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完善和补充这个主题的图景。我想说，据粗略估计，我大概阅读了两千封信件，通览了一万五千页到两万页的其他文件，包括许多此前并没有研究过的资料。而我把那些访谈作为一种补充资料，尽管访谈是写传记非常必要的资料之一。事实上，对我而言，能够采访到在伊文思生命故事中起过一定作用的某个人是一份意外的收获。然而，众所周知，将访谈作为史料的来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在对采访对象最有利的情況下，受访者经常会被有意地误导。我相信，通过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反复比较，能够避免写作伊文思传记过程中易出现的一些糟糕的陷阱或圈套。

虽然多年来伊文思深信他的生活都是在为自由而战，但反之也不无道理，而且晚年的他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本书中包括了许多让他的朋友沮丧痛苦，而他的敌人热烈欢迎的事件。就这样吧。我希望借此能够掀起一场关于伊文思的讨论，以反驳我对伊文思的过多批评。伊文思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党员。我相信在读了这部传记后，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人们会因此认为他不配被授予荷兰雄狮骑士勋爵吗？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头衔只是他作为电影人的一个点缀而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伊文思的大多数电影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纪录片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战后伊文思的影片虽然不再显得那么令人瞩目，但仍然技艺精湛，有时也会令人叹为观止，如他69岁拍摄于越南战区中部的影片《17度纬线》(17th Parallel)。他与妻子玛瑟琳·罗丽丹合作的他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代表了他的电影生涯中又一个令人惊奇的新转折。

伊文思对电影终身不懈的热情启迪了许多电影人的灵感。

在对与伊文思相关的历史事件、他跌宕起伏的电影生涯和动荡不安的个人生活的调研过程中，最令我震撼的是荷兰电影博物馆的前主任扬·德·瓦尔(Jan de Vaal)讲述的一则逸事。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漂

泊多年后伊文思首次回国，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考察他的电影收藏情况。当时放映了他于1929年拍摄的影片《雨》(*Rain*)。当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来时，他说：“那只狗没了。”那只狗只出现在影片一个几秒的镜头中，也许更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一只狗走出了画面。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了伊文思对纪录电影事业的挚爱与奉献精神。

尽管对伊文思的评价向来毁誉参半，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对他做出更加客观的评判，但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位杰出的电影人。正是这点促使我追随着伊文思的足迹，跨越了整个20世纪历史的巅峰与深谷。

本书的“致谢”部分列举了对本书写作给予贡献和帮助的人。这一英文版本与荷兰语版本相比略有删节。读者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伊文思与荷兰政府官僚主义争论的细节，请参阅荷兰语版的《冒险的生活》(*Gevaarlijk Leven*)。

汉斯·舒茨

1999年10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

目录

| | |
|-------------------------------------|-----|
| 中文版前言 | i |
| 前言 | iii |
| 第一章 老板之子 (1898—1921) | 1 |
| 第二章 狂恋 (1921—1927) | 14 |
| 第三章 日新月异的时代 (1927—1929) | 31 |
| 第四章 我们的确是这样干的 (1929) | 51 |
| 第五章 请你们倾听我的声音：父亲、母亲、停尸房 (1930—1931) | 63 |
| 第六章 磁力山 (1932) | 82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33) | 95 |
| 第八章 不愿提及的日子 (1934—1936) | 112 |
| 第九章 机遇 (1936) | 128 |
| 第十章 西班牙内战 (1937) | 139 |
| 第十一章 中国扑克 (1938) | 159 |
| 第十二章 战争期间的伊文思 (1939—1941) | 180 |
| 第十三章 革命的魅力男孩 (1941—1944) | 195 |
| 第十四章 棕榈树下的战争 (1944—1945) | 214 |
| 第十五章 印度尼西亚独立 (1945—1946) | 232 |

| | | |
|-------|----------------------|-----|
| 第十六章 | 铁幕后的大叔（1947—1950） | 251 |
| 第十七章 | 蓝皮书（1950—1956） | 271 |
| 第十八章 | 喘息的空间（1957—1960） | 296 |
| 第十九章 | 牛仔靴和游击帽（1960—1964） | 315 |
| 第二十章 | 社会主义特讯（1964—1968） | 339 |
| 第二十一章 | 69岁的伊文思（1968—1971） | 359 |
| 第二十二章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71—1978） | 375 |
| 第二十三章 | 与过去决裂（1978—1985） | 400 |
| 第二十四章 | 不吉祥的风（1985—1989） | 413 |
| | | |
| 致谢 | | 427 |
| 档案文献 | | 430 |
| 采访对象 | | 434 |
| 参考资料 | | 437 |
| 电影目录 | | 453 |
| 译者后记 | | 458 |

第一章

老板之子

(1898—1921)

从19世纪末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来看，1898年11月18日星期五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报纸上报道了发生在菲律宾的美国—西班牙战争，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的新闻报道“三支法国军队正向摩洛哥边境推进以及暴乱场景”，还有中国农民起义洗劫并掠夺了长江上游的一个小镇。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Case)*在法庭上一拖再拖，与此同时，在巴黎某地方，塞纳河上新的桥梁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 of Russia)参加了奠基仪式并启动了第一块奠基石。在海牙，尽管流言四起，荷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每周的听证会一如既往地举行着。

那天早晨(1898年11月18日)，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镇，一个名叫乔治·亨利·安东·伊文思(George Henri Anton Ivens)的小孩出生了，这就是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译者注。(星号为译者注，下同。)

后来闻名于世的尤里斯·伊文思 (Joris Ivens)。他的母亲朵拉·伊文思-穆斯肯斯 (Dora Ivens-Muskens) 在凡·博克恩斯特拉 (Van Berchenstraat) 15 号她的父母亲家里生下了小乔治，也没什么并发症之类的不良状况。那年，小乔治的父母已婚四年，母亲刚满 28 岁，父亲基斯 (Kees) 比母亲小一岁。乔治是他们的次子，长子名叫维姆 (Wim)，之后他们还育有三个孩子：汉斯 (Hans)、西娅 (Thea) 和科巴 (Coba)。这几个孩子分别比乔治小 5 岁、8 岁和 11 岁。

在乔治出生时，无人可以预料到小乔治会有一天参与另一场西班牙战争，或被美国当局遣返并要求他永久不能入境，之后他又被菲律宾拒绝入境。他将多年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为一位巴黎居民，他将会拍摄一部电影，其中表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剪彩的那座桥梁（这里指《塞纳河畔》），而那时，这位沙皇早已被反抗武装起义者一枪击毙。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些反抗者以后会与我们本书的这位永不疲倦的主人公建立良好的关系，人们也不会想到他会与荷兰殖民地事务大臣们的关系缺乏热情。

奈梅亨是一座由罗马人建造的古老城市，以一座名为沃霍夫 (Valhof) 的城堡而闻名，城堡由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建立在一座山丘上，可以俯瞰瓦尔河 (Waal)。19 世纪后半期，为了将奈梅亨重建为一个普通的荷兰小镇而拆毁了原来的大部分城墙和城门。但在尤里斯·伊文思的记忆中这座小镇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荷兰小镇，那里地中海的影响随处可见。”¹

每年，成千上万的船只从瓦尔河航行经过奈梅亨小镇，往返于鹿特丹和鲁尔区之间运输货物。古老的瓦尔河，经冬历夏的堤坝与水草交织的纷繁景象会使人思接千古而不知置身何处。乔治母亲的祖父母穆斯肯斯 (Muskense) 一家便在这条河岸居住，她家距离凡·博克恩斯特拉步行只需要十分钟。而乔治的祖父与那里的大多数商人一样从事粮食和种子的贸易。

乔治父亲的祖父海因里希·伊文思 (Heinrich Ivens) 先生是距离科隆西南几英里处艾弗伦 (Efferen) 小镇上的一个家具制造商，曾卷入过 1848 年的革命运动。² 乔治的祖父威廉·伊文思 (Wilhelm Ivens) 也出生在艾弗伦，威廉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于 1867 年左右迁居到奈梅亨开始涉足摄影行业。当时在奈梅亨已经有两位德国摄影师在从事摄影行业，其中一位就是威

廉的摄影老师。

1871年，威廉在奈梅亨创建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他具有很高的摄影专业水平并成为一名皇家御用摄影师。伊文思家族对成功的追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威廉不仅在奈梅亨非常活跃，在其他地方也一样活跃。他既是荷兰摄影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又是博爱协会（Humanitas Society）的秘书。博爱协会是一个致力于救助孤儿和青少年流浪者的慈善组织。³

1891年，威廉将摄影工作室的管理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基斯。而基斯对摄影技术和商业方面更感兴趣，他把这个家族工作室转变成了“摄影器材代理经销商”（Phototechnical Agency and Dealer in Photographic Articles）。1894年5月17日，他开展了一项新的业务，并与朵拉·穆斯肯斯（Dora Muskens）结婚，即使四十多年后，基斯仍将5月17日称为“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⁴

随着业务的蓬勃发展，公司逐渐在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Groningen）和海牙开设了分公司。董事总经理C. A. P. 伊文思（C. A. P. Ivens）上任后，公司更名为卡皮（Capi）[基斯是科内利斯（Cornelis）的缩写]。尽管基斯·伊文思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富有创新才华的人，但他却对文化艺术兴趣广泛。他会为家人演奏舒伯特的钢琴曲，并带他们到剧院看音乐会、戏剧及电影。艺术家简·托罗普（Jan Toorop）、尤金·勒克（Eugène Lückér）以及汉·皮克（Han Pieck）都曾拜访过基斯·伊文思。

基斯·伊文思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和担当感的人。他是镇议会的一员，为进步、自由和天主教“所有人的正义”而努力；他时任荷兰业余摄影师协会（Dutch Amateur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董事会员；他还是“信仰与科学”（Faith and Science）会的成员，这是天主教知识分子举行议会的一个社团。在一次会议上，基斯说：“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并坦率地承认我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善待他人，而不是过度狂热于宗教事务。归根结底，宽容，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尤里斯·伊文思曾称自己的父亲为“一位具有严格道德约束的人”。⁵因此，伊文思早年便谙熟为大众谋利益的思想。基斯·伊文思经常阅读自由主义报刊《每日商报》（*Algemeen Handelsblad*），对19世纪的进步思想坚信不疑。他曾发起建设默兹—瓦尔运河（Meuse-Waal Canal）和瓦尔大桥（Waal Bridge）两

项计划以取代渡轮。经过他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将这两个项目变为现实。在大桥建成之日，他看到奈梅亨和阿纳姆（Arnhem）之间交通状况得以改善——距离缩短至少 20 英里，打通两地之间的道路联系，尽管从国际化和洲际的角度来看，基斯的此番举措只不过是人类在热爱和平的发展征程中不值一提的一小步。“我们愿望的是，将来有一天，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看来会像现在发生的两个城市之间的争斗一样，让我们觉得极其荒谬。”⁶ 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先是被加封为爵士，后来又被奥兰治-拿骚王室任命为高级官员。在海尔德兰省和奈梅亨的新闻报道中，他热情洋溢地谈论技术变革：今天是伦琴（Roentgen），明天是爱迪生，之后是拉乌尔·皮克（Raoul Pictet），再然后是卢米埃尔，他所谈论的都是前所未闻的、吸引大众关注力的话题。⁷ 他甚至在公司的年会上都体现出广阔视野。在公司的宣传册子中，他回顾了奈梅亨几个世纪来的历史，以证明历史正以无法阻挡之势大踏步向更好的未来迈进。1939 年，他的长子维姆早殇，商业挫折以及将至的世界大战使基斯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是我们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引导我们人类沿着无形的大道通向一个最终的目标进取。”⁸

每当基斯·伊文思在与乔治外出散步时，他一定会使用这些令人振奋的语汇来描述自己的理想。后来，我们在尤里斯·伊文思六十多年的电影生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父亲这番话语的回响，那是在他谈自己的影片《风的故事》时说：“我们要拍风。因为它蕴含着所有事情的记忆，所有曾论及的一切都在风中。也许，我把风视为人类伟大前进的潮流，无论是细水长流般的缓进，还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逆流，抑或是文明的没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推动历史向前发展。”⁹

基斯·伊文思既是一位自由主义信仰者又是一位颇具主导性和影响力的人物。卡皮公司的一些员工，他称之为卡皮人，认为他是位严厉的上司和心怀壮志之士。在家里，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女儿西娅回忆说：“他从来不会拍桌子发脾气，但当他说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人做到。”他会一次又一次地跟你说同一件事情，直到你心甘情愿地按照他的要求做到他想要你做的事情。尤里斯·伊文思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一方面，他会给你很好

的安全感，会保护你，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极其苛刻。”¹⁰ 基斯·伊文思害怕一切混乱和意外。他坚信“秩序是任何企业的灵魂”，但他的组织才华却不只限于商业领域。乔治曾收到过一封母亲写给他的，但却“没让父亲读过”的信。信中她这样评价伊文思的父亲，他“一直如此热衷于安排和处理一切，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预定的道路行进。但这一方式只适用于木偶，并不适合于人”。¹¹ 乔治没有他父亲那种热衷于组织他人或事物的热情，但时间将会证明，他与他的父亲具有非常相似的一点，那就是认定了的事情绝不轻易改变。

乔治充沛的精力来自于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而他的温文尔雅则来自他的母亲朵拉·伊文思。母亲朵拉是一个小巧、丰满的女人，她经常把一头黑发盘成高高的发髻。从照片上来看，她的表情总是很和蔼可亲。她很敏感、能干且有创意，这些都得到了她的丈夫、子女、孙子及卡皮人的一致赞扬，她从来不说谁的坏话。简·托罗普曾为她画过两幅肖像，在一次采访中，托罗普描述朵拉，“她是一个有艺术品位、平静的聪明的女人。”基斯·伊文思在日记中写道：“在场的每个人都发自肺腑地赞同托罗普对朵拉的这句评语。”¹²

伊文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深爱母亲，但之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现实并不像他说得那么简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为什么那么晚才与家里人取得联系？他为什么在德国投降后的第16个月，在日本投降后的第13个月才写了第一封战后家书给他的母亲？那时他已经在海外漂泊了八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历经了战争的多年煎熬，妹妹西娅的丈夫被枪杀于战争胜利前夕。当他在1947年终于回到了奈梅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仅走访了两处就匆匆结束了行程，“时间只够去看一下我的母亲，拥抱她一下，然后稍微聊几句。时间只够我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一次梳理，之后我就再一次离他们而远去。”¹³ 而14个月后母亲朵拉去世的时候，伊文思身在国外，也没有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什么原因使伊文思这么快就转身离家而去？什么原因使他在23岁时就愤激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说：“特别是当我看到周围人们的婚姻，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与斯特林堡（指瑞典的约翰·奥古斯

特·斯特林堡^{*})的很多思想不谋而合,即认为女人是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¹⁴

伊文思的父亲心胸开阔,属于主导型强人,他的母亲似乎一直生活在父亲身影的笼罩之下。每天晚上, she 会把丈夫的拖鞋放在他专属的椅子前,这椅子其他人不得触碰。乔治“咬牙切齿”地目睹着这一切,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他觉得母亲显得恭顺屈从。“在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第一个盛饭给他,然后给他最好的菜肴。若菜肴是一份份端上的,总是要他先吃,其他人总是要等待。我对他所有的特权感到非常的气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小乔治是否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保护他的母亲呢?事实上,对他而言,朵拉就是善良的化身,人们几乎不可能拒绝她要求的任何事情,她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家人更多的关心和友爱。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种情况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即当他自己在某个年龄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和自由时,他会觉得对自己母亲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此,孩子会有逃离的冲动,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如果与某些人的关系比较激烈时,他会有一种威胁感。

朵拉·伊文思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总是带着孩子们参加每个周日的弥撒。当孩子们日渐长大,她就告诉孩子们:“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去教堂,你可以不去,不要只是为了让我开心,而逼着自己去做。”¹⁵而孩子们的做法的确是为了让母亲开心,坚持去参加周日的弥撒。在伊文思弥留之际,他以这样几句话总结他在奈梅亨度过的童年:“那里有我的童年,在那里我过着幸福的生活。”¹⁶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最早的记忆是他的火车之旅。那年他五岁,他和哥哥维姆对陌生人做鬼脸,试图阻止陌生人进入他们的车厢:“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来保护我们家庭的甜蜜以远离外面世界的危险。”“毫无疑问,在这幅童年图景中,这种备受呵护的生活环境里可以得到大量的真知灼见,教导孩子们用开阔的视野来观察这个世界,父亲为家庭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母亲则保证家庭温暖祥和。但这样的生活图景也会存在另外一面。在奈梅亨的凡·博克恩斯特拉这个家庭必须是和谐的,不允许有任何意见的发生。你必须压抑自己的一切想法。不能公开争辩,这是规矩。”¹⁷

*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斯特林堡一生共写过六十多个剧本,大量的小说、诗歌和关于语言研究的著作。他的剧作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又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对欧洲和美国的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对当时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译者注。

在这光鲜的外表下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紧张和挫折。

在一张 1905 年拍的照片上，六岁的乔治身着水手服彬彬有礼。而另外一张照片，他手持荷兰国旗打扮成一个水手。1909 年荷兰王国的未来女王朱莉安娜 (Juliana) 公主诞生了，伊文思一家是坚定的保皇派。¹⁸

相比较而言，乔治是一个模范儿子。他的一位儿时朋友后来回忆起他们一起在户外玩耍的事情：“你有一点令人懊恼的是，那天下午大约 4 点半的样子，你抓住了我的外套，告诉我，我们必须快一点，因为你不想错过格拉芙斯威格教堂礼拜最后的祝福……不管我怎么说或是怎么做，你始终要坚持去做礼拜。”¹⁹ 乔治·伊文思直到十多岁还坚持去做礼拜，他曾经是一位忠实的信徒。

少年时代，乔治表现出惊人的技术洞察力和进取心并引起了他的父亲与祖父的注意。观看了飞行员让·奥列斯拉格斯 (Jan Olieslagers) 在奈梅亨田野上的飞行表演后，乔治决定建造自己的飞机。在哥哥维姆的帮助下，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架自制的飞机就停在了他家的花园里。尽管这架飞机并没有飞起来，但据照片显示，这是一架尺寸为布莱里奥特 (Blériot) 机型一半大小的复制品。又过了三个月，乔治改进了这架飞机，还配置了摇杆及可移动的机翼。

1911 年，乔治被送到他的父亲曾经念过的克劳恩布尔格辛格尔 (Kronenburgersingel) 市高中去读书。原本他的母亲更希望他能够念天主教学校，但伊文思家族的传统是以商业利益更为重要的。基斯·伊文思认为市立高中的教育优于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因为读市立高中前景更为广阔。他赞同高中应该有大学预科，因为乔治需要做好接管家族业务的准备。作为家里的长子，维姆应该是家族企业首选的继承人。但乔治却进入了大学预科，这样以后他可以继续读大学，证明他在学业上前途一片光明。就这样，没有任何的仪式，乔治被挑选成为父亲的未来接班人。当父亲做这个决定时乔治应该只有九岁或十岁的样子，也就是送维姆去念大学预科学校的时候。尤里斯·伊文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的父亲“自始至终”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还简练地补充说：“我接受了这个决定，并没有过多担心。因为我的性格一向是无忧无虑，在考虑了所有事情之后，我并不觉得那会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未来。”但是，